

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德〕孔滋 著
胡國堅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貴州大學出版社

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德」孔滋 著
胡國堅 譯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德）孔滋著；

胡國堅譯．— 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3.10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

ISBN 978-7-81126-630-6

I．①佛… II．①孔… ②胡… III．①佛教史—思想

史—研究—印度 IV．①B949.3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13）第 255246 號

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

著 者：〔德〕孔滋

譯 者：胡國堅

責任編輯：立 人 滕 芸

出版發行：貴州大學出版社

印 刷：貴州創興彩印廠

開 本：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7

字 數：160 千

版 次：2013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81126-630-6

定 價：60.00 元

版權所有 違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聯繫調換

電話：0851-5981027

本書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本書為 2013 年貴州省新聞出版局重點圖書，
并獲貴州省出版發展專項資金資助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學術委員會

- 方立天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樓宇烈 教授（北京大學）
黃心川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楊曾文 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張風雷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宣 方 教授（中國人民大學）
李四龍 教授（北京大學）
龔 隲 教授（中山大學）
馮煥珍 教授（中山大學）
洪修平 教授（南京大學）
徐文明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
王雷泉 教授（復旦大學）
陳士強 教授（復旦大學）
麻天祥 教授（武漢大學）
藍吉富 教授（中國臺灣）
林鎮國 教授（中國臺灣）
宋立道 研究員（中佛協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出版前言

《現代世界佛學文庫》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立項的“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第一期工程已經得到貴州省新聞出版局的出版基金資助。這個《文庫》的總編纂指導者是國內著名佛教學專家。參與編纂工作的有老中青三代學人。中青年學者們都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佛教學才俊。老一輩的學者有中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教授、北京大學的樓宇烈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名譽學部委員黃心川教授和楊曾文教授等。承擔《文庫》出版任務的是我們貴州大學出版社。本出版計畫分爲三期工程進行，計畫搜羅或再版國際佛教學研究界的最重要作品，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國（含臺灣地區）、日本和歐美的佛教學研究界在過去二百年中的標杆性作品。

本《文庫》爲開放性的出版項目，其最終出版的規模大小，取決於所涉及作品的版權的解決，更取決於貴州大學出版社的經濟實力，也取決於參與本《文庫》從推薦書目到編纂出版的合作者的努力。本社之所以不自量力，承擔了這麼一個耗資大、耗時長而費力甚艱的文化工程，所企望者，是爲國內的佛教學研究界提供一批便於利用的經典之作，爲中國的文化建設與文化繁榮盡一個出版者的綿薄之力，當然，也還有巡禮過去二百年來世界佛教學研究中輝煌成果的用意。我們相信，佛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精神財

富之一。佛教學研究是全人類共同的宗教學術探索的精神活動，它也是東西方人文學者的精神創造力的結晶。

佛教原本是東方思想寶庫當中的最重要的一份財富。兩千多年前，佛教在印度誕生。從那裏向四面八方傳播，在南方形成了巴利語佛教；經西北方的中亞向遠東傳播，形成了漢語系的佛教。佛教思想在漢、韓、日的民族文化當中生根發芽，開出了朵朵奇葩；佛教也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尋到了自己的家園，孕育出神奇瑰麗的藏語系佛教文化。對於西藏佛教的關注，從二十世紀中期以後，已經成為世界宗教文化研究的熱點。這三大語系的佛教，又稱為南傳佛教、北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其中南傳佛教，因為其教理教義上距佛陀本人生活佈道的時期最近，往往被認為深得原始佛教的真義，是初期佛教部派時期的上座長老們的傳統，故也稱上座部佛教。北傳佛教的經典語言是中古以來的漢語，故也稱漢傳佛教。漢語系的經典，從西元之初以降，及至近代，一直使用漢文書寫流傳於世。佛陀的言教，雖然譯自當時的梵語或中亞地方語言，但一經寫為漢文佛典，也在古代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通行無阻。藏傳佛教的經典形成於十世紀以後，書寫系統和宗教內涵都深受印度思想文化的浸淫。

從空間位置上看，誕生於古代印度的佛教，雖然向四方傳播，但其最顯著的成果則祇在東土和南方顯現。在世界史上的西元之初，佛教并未涉足北方的西伯利亞草原，當時那裏生活的遊牧人群，還無緣沐浴印度的思想光輝；而在同時期的歐洲，因為先已有燦爛的希臘羅馬文明，更有新近誕生的基督教，以及在中近東已經存在上千年的猶太宗教，佛教大約祇能止步於彼。儘管如此，在西元後的最初數百年間，佛教也已進入西方人的視野。在馬其頓希

臘帝國的亞歷山大皇帝眼中，佛教祇是東方斑斕而陸離的諸多宗教文化之一。

以歐洲為代指的西方世界對佛教的真正興趣始於近現代。西方人對佛教的留意，開始於他們在東方的殖民經營。西方學術界對佛教的研究，說來也祇有約二百來年的歷史。歐洲經過了工業革命並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以後，歐洲文化也挾商業主義和殖民主義之勢向東方侵入。歐洲的宗教、歐洲的思想文化和歐洲的價值觀念，在數百年當中橫掃東方世界，對那裏固有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引起了巨大的變化。西方世界對於亞洲佛教的興趣、關注和研究，正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模式自西而東的大趨勢中產生的文化副產品。

本《文庫》的作品遴選，祇是基於中國佛教文化的立場，出於中國佛學的視角。其所關注的是佛教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即佛教的經典與教理、宗派與學派、佛教的制度、佛教的實踐，以及它們同佛教所寄身的社會和依存的文化傳統間的內在聯繫。《文庫》力圖包容含攝的，除了近現代中國優秀學者的著作，更多屬意於歐美的和東瀛日本的佛學著作。本《文庫》的涵蓋時間，僅及過去的二百多年，自然不能代表佛教在二千五百年來的全部的思想創造與文化積蘊。但因其側重的是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成果，而驅動這一學術探索活動的，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科學與理性是西方佛學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所有的佛學研究成果便具有了與東方世界古來傳統迥然有異的現代精神含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我們編纂這部《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的本意。

對我們中國而言，佛學研究，古已有之。廣義的佛教學或佛學研究，起步於二千年前佛教傳入中國之時。但從那以後，傳統的佛

學研究是服務於宗教解脫目標的，與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有很大的意義差別。傳統中國的佛學研究，最初的對象雖然自外而來，但活動則是一個文化體系內部的自我研究與自我發現，而近現代西方的佛學研究，則多半是來自外部的學術干預。借用後殖民時代的說法，近現代的佛教學研究視角則完全自外而來的、“他者的”眼光和態度，這種研究隔著雙重的距離——文化的距離感、時代的距離感。從常情上說，近現代西方的佛教學研究，研究者不可能不帶著先有的“成見”或“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涉入。按專門研究現代性的社會學家吉登斯的說法，研究者或觀察者在理解時，已經受到“視域”的限制，他們不得受制於研究對象的文本和自身的文化身份和立場。吉登斯稱其為“*double context*”（雙重的視域），也就是來自研究對象和研究者自身兩方面的限制，其研究與考察與佛教傳統背景、與學者的知識結構、文化立場與態度都密切相關。

以往傳統當中的佛教學者，無論僧俗，都是佛教的信仰者，其佛學研究的根本目標指向宗教解脫。其學術活動的起點與終點，都祇能是要想達到“解生脫死”，具有強烈的解脫實踐的特點。西方的佛教學研究，以及從事這項工作的學者，其學術研究活動並不必然聯繫於宗教目標，這首先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所決定的。二百年來的西方佛教學研究，經歷了“宗教學的一民族學的一人類學的”方法論和目的論過程，大致屬於世俗的學術研究。從宏觀方面看，他們借鑒了西方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的方法，而在更加技術性的層面，他們在研究當中，也就坦率地採取了比較語言學的、考古學的、文獻學的手段。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佛教學研究領域內出現的詮釋學研究方法，也大量

借鑒了後現代和後殖民研究的立場、觀點與態度。

就此而言，我們的東鄰日本，其佛教學研究，從明治維新以來，也逐步脫離了以宗教解脫為目的的治學實踐，循著世俗主義的學術路子前進。在保留和繼承佛學研究當中的優秀學術風格與手段（文字訓詁、文獻考訂、史論結合）等的同時，日本佛教學研究也吸收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甚至社會文化批評的方法。就日本佛教學術界言，其所產生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纍纍碩果，都產生在十九世紀以降，在日本學者接引了來自西方的，尤其英國和德國的宗教學研究方法之後。

有鑒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出版的《現代世界佛學文庫》，致力於搜羅過去二百多年來歐洲與北美的，以及日本的近現代佛教學研究作品。這裏的“近現代”，既有時間上的，也是以理性主義為特質的現代研究方法論意義上的。

佛教學研究是學術性的研究，究其本底而言，與政治目的無關。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在涉入研究領域時，又不免受到其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價值論立場的影響。因此，學者的發言主張，及其學術結論也不免受到時代政治風氣、學術風氣的影響，在有的情況下，其研究方法也難盡脫政治文化的干預。我們在肯定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思潮影響下產生的世界佛學研究成果時，另一面也要小心謹慎，言所當言，止所當止。

本《文庫》總結過去二百多年來的佛學成果，大致劃分出以下三個階段的時間框架：

一、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中期。這一時期，學者們大都致力於用比較語言學的、古文字學的和文獻學的方法來處理佛教的歷史與經典，力求揭示佛教的“本來面目”，力圖展示佛教內在的

“不變的本質”或者“真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佛學研究範型：英國—德國學派的，俄國“列寧格勒學派”的，以及法國—比利時學派的。

二、二十世紀中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可以看法一比學派的學術風格的繼續發展，其他的兩家已經式微。此期的佛教學研究，在原有的語言學、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更多引入了社會科學的多種方法，諸如政治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技術手段被大量植入，而當詮釋學方法引入這一領域後，西方佛學研究更多地呈現了社會關懷和政治批判，不再祇是純學術的“象牙塔”內的學問。

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佛學研究。繼續發揮前兩個階段的優秀學術特點，而隨著西方世界這一時期逐步展開的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的反省與批判，隨著普世價值觀和文化多元態度的形成，歐美的和日本的佛教學研究也都開始涉及了帶有“後殖民”與“後現代”色彩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批判活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東洋”日本的佛教學。它的展開，大致與上述三個時段同步。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佛教學術界，先是借鑒和遵循英德佛學研究的路子，如今則多與北美的佛學研究界聲氣相通。當前日本的佛教學研究，除了配合對日本宗教文化與思維的自省與批判，還有研究的細碎分化傾向，不過這正是社會文化多元發展在佛學研究領域內的反映。

經過兩年的努力，《現代世界佛學文庫》第一輯終於問世。我們希望奉獻於文化界和宗教界的這些經典作品，能夠受到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我們懷著出版人的恭謙與惴惴不安，期待來自社會各界的學術批評和對我們的編纂工作的技術批評。

最後我們非常抱歉地在這裏聲明一句，由於著作權許可的聯繫工作的實際困難，我們這套《文庫》的作品，有的尚未得到原著者或翻譯者的授權。於此，我們懇請諸位大德同我們出版社聯繫，以便我社同權利人辦理相關的授權協議事宜。再次為我們的冒昧致歉，並表達深摯的感恩之情。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貴州大學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本冊說明

本書為近五十年來馳譽歐美的佛教學者孔滋(E. J. D. Conze)的名著。原名為《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初版於1951年，先後又有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荷蘭文、日本語等譯本。其於國際學術界之風行，由此可見一斑。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印度佛教，對其他系統的佛教記述較少。全書主要在論述印度佛教之基本特質及其歷史發展。因此，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印度思想史導論。

作者孔滋博士，德國人，由於長年居住在英國，所以一般都視之為英國學者。他一生著述甚多，從1939年開始有著作問世，一直到1968年為止，總共出版了十八部二十冊大作。其中，以般若經的研究為多，共計九部十一冊。大多是有關般若經的經文校訂、翻譯、辭典、經文選粹等。因此，他是弘揚般若經於歐美的大功臣。此外，由於他具有深邃的哲學分析能力，其著述能對佛教思想加以融會貫通，因此，也被視為佛教哲學家或佛教思想家。

本書譯者胡國堅先生，福建詔安人，先後畢業於中國臺灣中興大學公共行政系與臺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後任職於臺灣電力公司，并兼任《諦觀》雜誌主編，是一業餘的佛教研究者。

序

關於佛教方面的敘述，無論是在英語地區或是其他語系地區，目前尚找不到一本像 Conze 博士這本如此淵博、簡明而又具有可讀性的著作。

您或許知道國王問瞎子象為何物的故事。有的觸及其身體而說它“像戰車”；有的觸及耳朵而說它像“揚風扇”，各種說詞不一而足。上面的故事或足以說明歐洲關於佛家史的撰寫情形。這并不能怪歷史學者。因為在 19 世紀時，容易取得的典籍，就只有尼泊爾 (Nepal) 地區代表中期佛教的部分。由於後來對相當早的斯里蘭卡 (Ceylon) 典藏的再獲有相當大的好感，以至於 (在斯里蘭卡發現到的) 巴利 (Pali) 佛典被當做是早期佛教的全部內容。最近的如 1932 年 Rhys Davids 夫人的《佛教高級學者手冊》(Manual of Buddhism for Advanced Students, 這是一個相當有雄心的名稱)，甚至除了對巴利佛典的研究有用外，對於其他的幫助甚少。該書出版一年後有 E. J. Thomas 之較為周全的著作：《佛教思想史》(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 的問世，但這本書與其說是給大家看的，不如說是給專家看的較為妥。其他的著作，如 Keith 的《佛教哲學》(Buddhist Philosophy)，都只是一些一般人所持的觀點，不但無足輕重，而且大多“缺乏體系與成熟度”。在 Conze 看來，佛教所質問的及所提的解答是很實在而活生生的，他將它們

以歷史及當前的社會實況結合為一種體系。

個人認為一本書若未嘗表現出某種論點則屬無價值，而書表現觀點的方法必出以使讀者的情感與知識對諸事實的反映更為明白，而不是出以扭曲事實。

Conze 博士此書對於這點的成功，實勝於我長期以來所讀過之類似的書籍。

阿瑟·威利 (Arthur Waley)

作者序

本書的觀念係筆者與友人在 1941 年產生的，當時筆者住在 Hampshire 的 Godshill，我們想找找看到底這個時代中，佛教的禪定 (meditation) 有多少可以真正的實行。前面數章係筆者數年前在牛津 (Oxford) 聖彼德廳 (St. Peter's Hall) 所做的演講內容，故字裏行間尚留有順應聽衆的痕迹。在 1948 年，牛津的 William Cohn 博士曾向我提到，包羅佛教各方面內容的作品應該給予高度的評價，並鼓勵我完成本書。本書完成的最後階段，Cohn 博士、Arthur Waley 先生及 Christmas Humphreys 先生等人幫助我除去許多錯誤。Claud Sutton 及 Arthur Southgate 兩位先生使本書保持了英文的風格。筆者希望在與許多學者討論了以後，能夠對許多困難而且有爭論性的地方處理無誤。在此，筆者對 F. W. Thomas 教授、E. J. Thomas 博士、科倫坡 (Colombo) 的 Murti 教授、魯汶 (Louvain) 的 Lamotte 教授、巴黎 (Paris) 的戴密微 (Demieville) 教授、羅馬 (Rome) Tucci 教授以及萊登 (Leyden) 的 Pott 博士等人深深致謝。我所據以為解釋之根據的經典從未譯成英文。也許有一天可能有人會提供給讀者一種取自重要佛典的選集，那一定比僅在本書敘述有意義得多了。

愛德華·孔滋 (Edward Conze)

1951 年元月於 Ewelme, Saffron Close

譯者序

余譯畢本書，有數語可言：

(一) 余從事本書之翻譯，就佛理言之，實諸因緣和合有以致之，因緣本不可分，勉強析之，約略有三：余研探佛法，始於大學，間嘗因故或稍中輟，然興味之濃，有增無已，殆為不可變易，以其一；偶然結識致中法師，師曾創《正觀》（後因故改為《諦觀》），承師不棄邀而著手寫譯，此其二；自閱讀友人郭忠生關於佛學之譯述，得知國外研究佛學之甚與成果之豐，於是眼界大開，猶井底之蛙躍出窄口而見大世界，知佛學可探究之處仍繁，此其三；並因上述因緣而決心從事佛學名著之譯述事業。

(二) 翻譯之難，先輩多所言述，未躬身著手，實難以體味，余自無需多所贅語。間當擲筆感喟，幾難以繼，懷念及我中國佛教文化之衰，實病於心胸偏狹，此則眼界未開實害之也！遂發心自勉，顧自譯述外文佛學名著途徑，為中國佛教之復興而爭千秋。余在“研究佛法的基本認識”一文（原文未署名，刊《正觀》第三期第一版）中嘗引太虛大師之言：“依流傳在中國者，攝持斯里蘭卡傳者，及擇取藏傳佛教者，為一批評而綜合而陶鑄之新體系，庶幾為著述印度佛教史之目標歟！”並繼而斷曰：“這段話在今日看來，仍有其價值。”又曾於《諦觀》發刊詞“我們的感嘆，作法與期望”（第一期）文中呼吁：“希望有佛學素養的大德們，能將他國的佛學名著譯為華文，來